

# 从近代藏区食盐贸易看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叶倩 艾丽娅·艾力肯 周彤

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盐业自古以来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有着密切关系。自国家对食盐实行专卖后，食盐交换成为政府在民族地区羁縻政策的重要手段，少数民族对于食盐的需求也增强了与汉族的互动。自唐代开始汉族与川西藏族之间就通过“茶马古道”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政府对食盐的专卖，民间也存在私人买卖食盐，如川商、陕商以及寺庙商人，他们的出现对于汉藏食盐的贸易往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本文主要从近代汉藏民族物产交流的视角，以汉藏食盐互动为基础，深入探讨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食盐贸易，包括对于贸易途径、贸易双方以及贸易影响的研究，能够通过这一视角展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物产交流的密切及贸易往来对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汉藏民族；食盐贸易；“三文”

## 一、晚清至民国康区汉藏食盐互动概况

茶原产于中华，茶的原生地或说在四川或说在云南。四川主要的盐产地在自贡，自贡的盐业资源丰富，是我国最大的井盐产地。除自贡外，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也是较大的盐产区。

盐源县境内岩盐矿计有大中型矿床各一个，其余地段也有岩盐，盐泉数十处，盐井河、黑盐塘盐泉含盐量较高。明、清实行民产、官引、商运、商销，每到冬春农闲季节，西昌、盐边、米易、德昌、冕宁、越西乃至川滇、康藏边境的小商小贩，运来当地土特产品出售后购买盐源县的食盐回当地销售<sup>[1]</sup>。盐源东接西昌、西邻云南宁蒗、北连木里、南和德昌、米易、盐边隔河相

望。这些邻县都是盐场盐的运线和销岸地方。四川地区所产巨额的食盐，促成了巨大的川盐运销网和广阔的市场。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以后，川盐销售逐渐划定了计岸、边岸、楚岸、票岸，并开始销行康、藏等地。咸丰、同治年间，川盐运销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民国前期，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休，四川盐业遭到严重打击，许多井灶因而减产、停产，川盐产量，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为820多万担（41000万公斤），降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740多万担（37000多万公斤）<sup>[2]</sup>，直到抗战时期，各地食盐生产及供给受阻，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在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发展起来，食盐远销各地。

与内地的生活及饮食习惯不同，因为康区人民生活在高寒地区，他们的食物以牛羊肉等高热量的肉为主。在松赞干布一统藏区之后社会进入农奴制时代，大部分藏民变生食为熟食，因此盐就必然成为了藏民生活的必需品，用来调制食物。中央王朝就利用盐茶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换取中原急需的战马。在藏区食盐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原料之一，藏区的本地食盐主要来源于青藏高原的井盐和湖盐，主要的产盐地仅有盐井县、芒康县两地，尤以芒康盐井古盐田为著名，距今已有1300年历史。

芒康盐井位于西藏芒康县盐井镇澜沧江东西两岸，是我国唯一保持完整最原始手工晒盐方式的地方，但因其产量低下、制造工艺繁琐，并不能满足藏区人民的日常需要，因此急需买入内地食盐。藏民多在打箭炉（今

**项目基金：**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邮编：610041）2024年中央高校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3300224725）的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

叶倩（1999年9月—）湖北十堰，汉族，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艾丽娅·艾力肯（1999年4月—）维吾尔族，新疆吐鲁番，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学；

周彤（1996年11月—）四川成都，汉族，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康定)以药材、香料与商人易盐。总之,康区地外边远,交通闭塞,盐荒现象严重存在、斗米斤盐,贫民吃“涮涮盐,生活极为困苦<sup>[3]</sup>。”盐井的铁链木桥自“茶马古道”开通,是藏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解放以前,那里集聚着很多来自云南德钦、芒康、昌都、四川巴塘等地的马帮群,交易各种物资,主要有藏族的羊毛、羊皮等东西和汉族带来的茶叶、瓷碗、盐等商品。川盐、滇盐等内地盐一般流通于康区的汉藏杂居之地,不同地方的盐业资源在康区形成了各自的行销区域,食盐贸易是维持康区内部及其周边族群关系的重要机制和纽带<sup>[4]</sup>。

## 二、晚清至民国汉藏食盐的销路及运销

茶马古道作为汉藏经济文化纽带,其发展催生出青藏、川藏、滇藏三条主干道及支线网络。商队通过网络实现食盐等重要物资跨区域流通,以成都为起点,经邛崃、雅安至西昌分东西两线入滇。清代商旅驮运规模达“日以千驮”,至民国时期因匪患导致“闰盐古道”衰落。盐源县因盛产盐铁形成的特殊交通枢纽地位,维系着川康与藏区的贸易往来。

除此之外,从古延续至近代,甚至现在还存在的或官方或民间的驿道也是食盐贸易的重要媒介,而驿道途径的城市自然也成为重要的“中转站”,盐源县就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四川汉族地区与藏族地区交流互动的重要交汇。驿道乃古代交通要道,为驿马通行开辟,与盐源县连接的驿道有六条:盐西道、盐米道、盐菴道、北大道、北西线、西盐路,汉藏之间的食盐贸易也多数依靠驿道,驿道贸易多数由百姓肩挑或牛驼,驿道费用则视道路之远近难易而有不同<sup>[6]</sup>。受限于产能,盐源场实际供给仅覆盖四县,凸显供需矛盾。

食盐的运销历来受到政府控制。宋以后历代统治阶级,都是实行“引盐”运销制度,准许商人凭“引”运销盐斤<sup>[7]</sup>。民国建立后,各地开始逐步取消引岸制度。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四川推行统制政策但成效不彰<sup>[8]</sup>。1913年盐源县改制票岸制,实行商专卖。这一办法,迨至建国后,才被废除。《中国盐政实录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载:“票盐销区,盐源场配销盐源、西昌、会理、盐边、冕宁等县”<sup>[9]</sup>。票盐制度下形成特殊贸易模式——春冬两季商贩以物易盐,通过区域差价维系藏区供给。

新中国成立后,川藏交通建设虽削弱古道运输功能,但其历史价值在于:第一,构建起跨地域经济文化廊道,促进多民族交往融合;第二,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生态;

第三,为西南边疆治理提供物质基础。古道遗存见证了西部社会经济的结构变迁。

## 三、近代汉藏食盐互动的多种角色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开始,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群也在促进汉藏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等互动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藏人首领及汉人官员;2、民国时期的学者兼行政管理人員;3、促进商贸活动的商人。根据民族特性可分为汉商、藏商等;根据祖籍地可分为陕商、川商和滇商等<sup>[10]</sup>。陕西商人人数比重较大,来此经营时间也很早,川陕商人分布康定最多,甘孜、理化、巴安、西宁、昌都等地为次<sup>[11]</sup>。汉族商人的主体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家庭或个人,部分还在康南和康北主要贸易通道沿线拥有商号或商铺。长期在康区经商的汉商,由于熟悉情况且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之与藏、汉民众联系交往密切,随着民国政府加强对汉藏边境的统治,部分汉商进入到地方政府任职,并在巩固政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12]</sup>。

藏商在边贸中占据主导地位,因其长期居住在藏区,且因对藏区的地理位置及风土人情的了解,控制了大量的财富和贸易活动。藏族商人是资力雄厚的,多来自北路的昌都、德格和西藏,其余小商多来自南路<sup>[13]</sup>。在汉藏贸易的历史进程中,藏地商人群体因背景与职能差异形成了鲜明分层。其中多数商人实为宗教势力或地方权贵的商业代言人,其身份构成可依据资本来源与贸易角色划分为四大类型:

首要核心当属寺庙商人。自13世纪西藏确立封建农奴制后,寺院系统凭借政教合一的特殊地位,逐渐发展为兼具宗教传播与经济运营的双重实体。这类商人依托寺院通过土地赏赐、信徒布施及庄园经营积累的庞大资源,既管理上千座寺院的日常贸易,又通过商队将宗教影响力与经济利益同步扩张,形成僧侣集团与世俗领主深度捆绑的利益共同体。其次是以康区、安多边疆地带土司头人为代表的区域代理人。这些地方统治者凭借对农牧资源的掌控,在汉藏交界处构建起区域性贸易网络,其商业行为本质是封建领主权力的外延。第三类贵族私商多出自世家大族,其原始资本往往来源于对属民的剥削。这类商人虽属私人经营,却常与寺院资本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出西藏社会僧俗统治阶层的利益交织。最后是康定(旧称打箭炉)的锅庄商人群体。作为汉藏贸易的中介枢纽,他们不仅经营货栈仓储,更承担着跨文化交易中的信用担保、货币兑换等特殊职能,在茶马

古道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衔接者角色。这种独特的商业模式,既是汉藏经济互补性的产物,也折射出边疆地带的多元文化交融特征<sup>[14]</sup>。

民国时期,康区成为诸多复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势力所争夺的“中间地带”,但它也是一个贸易、商业活动和观念交流十分活跃的地区,成为不同族群间相互交融的重要“文化走廊”,使各民族间相互贸易、相互交流、相互妥协,相互观念融合。正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也成为各地商品的“集散地”,各地商人也成为各地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中间人”。商人阶层在促成康区出现稳定的集权权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促进了贸易发展,保障了贸易安全<sup>[15]</sup>。

#### 四、近代汉藏食盐互动的长期效益

从汉藏食盐贸易的本身来看,食盐从内陆地区流通到藏区,一方面能够为内陆地区的盐产地提供稳定的销售基地,另一方面为藏区人民带去了宝贵的生活必需品。内陆食盐进入藏区,增加了食盐的销售量。食盐不同于其他商品,食盐开采是个固定的数目,开采后出售越多越能弥补开采成本,多了藏区这条销路就大大降低了食盐的开采成本。而在食盐进入藏区之前,藏族人民受制于本地食盐的产量低、价格高等问题,对于食盐的需求大部分人得不到满足,内陆食盐传入后,食盐供给量增加,食盐不再是“珍稀品”,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其次,食盐的交换促进了商品流通,增强市场活力。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在农作物种植及畜牧业方面受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不同的地区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会着重于畜牧业或者农业,这就导致地区性的产品固化严重,而商品流通就很好的缓解了这一问题,食盐在商品流通当中占据着重要角色,不论是对地区经济发展还是地区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来说,都有着较大的积极意义。

从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看,汉藏食盐的互动有效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的西南边疆催生出了盐产业,为当地的民族提供了新的生存策略——晒盐,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西南边疆的汉族及少数民族盐工始终用坚强的意志支撑着盐业的持续发展、支撑着藏区汉藏两族人民的基本生活,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出了贡献<sup>[16]</sup>。其次,盐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盐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地理环境的不利条件,通过盐的交换可以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影响。汉藏

两族人民本就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人文风俗,商人通过售卖食盐就会将汉藏两族不同的风格相互传递,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使得两族人民关系更加密切,增强了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及归属感。

#### 参考文献

- [1] 盐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盐源县志[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06).
- [2]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盐志[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55年.
- [3]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盐志[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55年.
- [4] 王海兵.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盐市、盐政与族群关系[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9月第37卷第5期.
- [5] 盐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盐源县志[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06).
- [6] 盐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盐源县志[M].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06).
- [7]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监厂.盐源盐厂志[M].盐源盐厂出版社.1988.
- [8]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盐志[M].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55年.
- [9]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监厂.盐源盐厂志[M].盐源盐厂出版社.1988.
- [10] 石硕,邹立波.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11]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10).
- [12] 王启龙.百年来汉藏关系史研究及相关问题[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13] 游时敏.四川近代贸易史料[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10).
- [14] 玉涿措姆.清末民国时期汉藏商人在康区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丁正华和邦达仓为例[J].中国藏学,2016年第4期.
- [15] 周翔,刘明乐.民国中后期西康省外地商人的族际互动及其社会影响初探[J].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6期.
- [16] 李何春.川青滇藏交界带以盐为载体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